

经济学研究

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政治经济学分析^{*}

韩文龙

【摘要】数字经济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新经济形态。在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是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在数字经济时代,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正在实现数字化变革。其中,数字生产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数字流通力提升了资本周转与价值实现的效率,数字分配力的普惠效应可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数字消费力将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和进一步扩大内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体,为了进一步培育数字经济竞争力,需要通过强化反垄断保持数字经济活力,通过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治理数字化和数据价值化这“四化”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通过形成“四位一体”的科技创新体系提高数字经济创新力。

【关键词】数字经济 高质量发展 社会再生产

【作者简介】韩文龙,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副教授,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 (2021) 02—0098—11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数字中国”,^①随后发展数字经济逐渐上升为国家重大经济发展战略。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进一步指出要“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②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体。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近5.2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6.2%,^③具有一定的数字经济规模优势和国际竞争力。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数字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20FJLB006)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②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汪洋参加看望和讨论》,《中国政协》2020年第10期,第8页。

③ 参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20年)——大变局下的可持续发展新动能》,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010/t20201014_359826.htm,2020年12月5日。

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对数字经济进行了定义，认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①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②尤其是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技术等数字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经济正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于中国而言，数字经济在释放消费潜力、拉动投资、创造就业和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③数字经济正在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数字经济也在创造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为中国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空间。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④数字经济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新经济形态。在新发展阶段，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智能制造、电商网购、线上服务等数字经济新业态已经成为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来源。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我们有必要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四个环节和生产关系的局部变革等方面来审视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并探索培育数字经济竞争力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一、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的数字化赋能与经济发展

在数字经济时代，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四个环节已经实现了数字化变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予了新动能和新活力。

（一）数字生产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生产力是人们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包括实体性要素（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和渗透性要素（科学技术、管理和信息等）。在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的实体性要素和渗透性要素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正在形成数字生产力。数字生产力是指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在利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打造数字产业过程中形成的改造世界和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在数字生产力中，劳动对象由传统的自然资源等实体性要素逐渐转向虚拟性要素以及实体性要素与虚拟性要素等的结合体，尤其是在数据价值化过程中，单纯的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劳动对象。劳动资料是劳动过程中所使用的物资资料和物质条件等，是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媒介，其中劳动工具具有决定性作用。劳动资料是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测量器”，劳动工具的水平往往可以反映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在数字劳动过程中，随着要素数据化以及交换和分工的拓展，劳动资料中的动力系统、控制系统、运输系统和信息传递系统也越来越数字化和智能化，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改变了人类所使用的劳动工具，正在用人工智能设备和工具不同程度地替代劳动者的脑力劳动。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者仍然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要素。在数字劳动过程中，数字化的知识和技能成为对劳动者的基本素质要求。掌握更高水平

① 《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http://www.g20chn.org/hywj/dncgwj/201609/t20160920_3474.html，2020年12月5日。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45页。

③ 参见刘航等：《基于中国实践的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研究——首届互联网与数字经济论坛综述》，《经济研究》2019年第3期，第204~208页。

④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37页。

数字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如科学家、工程师和高级技工等，成为推动数字经济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

在现代社会中，生产力的渗透性要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数字经济领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规律发挥着重要作用。科技正在改变着人类的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自身，发挥着经济社会发展“加速器”的作用。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已经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重要领域。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愈加突出。在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转型发展中，科技创新是最大的“助推器”。哪个行业的科技研发投入多、科技含量高，哪个行业的发展速度就快，获得的社会评价就高。管理也是渗透性要素中的重要内容。数字化过程既是技术变迁的过程，也是组织和管理变迁的过程。数字技术重塑了组织架构和管理过程，组织结构越来越扁平化和网络化，管理技术也越来越数字化和智能化。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使用，管理控制技术可以更好地实现对个体劳动者的监督和考核。数字技术带来的管理变革提高了组织能力和管理效率，有利于更好地组织资源进行社会扩大再生产。在数字劳动过程中，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正在取代传统的土地、资本等，成为核心生产条件。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尤其是大数据，不仅本身具有劳动对象的属性，同时也是实现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快速联系、劳动者之间密切合作、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紧密沟通的重要载体。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大数据产权的界定、定价和交易等可以实现数据要素的经济价值，同时创造新的数字财富。

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等实体性要素数字化的创造效应，以及数字科技、数字化管理、数字化知识和信息等渗透性要素的组合效应，可以进一步促进数字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目前，从世界范围看，数字生产力实现了极大发展。数据显示，2019年，数字经济发展较好的47个国家的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8万亿美元，占GDP的41.5%。^①在新发展阶段，要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就需要形成新的发展动力，而新动力的来源就在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模式创新等。数字生产力是适应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而形成的改造自然和创造新财富的能力，理应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当前，通过改革和创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数字生产力，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是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数字流通力提升了资本周转与价值实现的效率

在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创新、场景创新、组织创新和模式创新带动了数字流通力的快速发展。数字流通力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实现信息流和数据流的快速聚合、提取和挖掘，进而整合各个流通环节，缩短流通时间，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流通效率的能力。在工业化时代，铁路、公路、飞机和船舶的使用加快了商品的国内流通和国际流通。在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等数字信息技术加快了信息和数据的流通，优化了传统的流通网络，创新了组织形式，形成了强大的互联互通能力，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数字技术改变了流通的内容。在工业社会中，可以贸易的主要是实体性商品；而凭借数字存储技术和互联网的链接功能，很多之前不可贸易的服务也变得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交易。在全球的数字贸易中，服务贸易占比不断增加，可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张，贸易的方式不断创新，已经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

^① 参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20年）——大变局下的可持续发展新动能》，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s/202010/t20201014_359826.htm，2020年12月5日。

平台经济正在成为数字经济领域发展的新趋势，它依靠数据收集、数据传输、数据处理和数据挖掘等实现了商品流和信息流的集成，正在形成跨越时空的全球性生产和销售网络体系，影响着全球范围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活动。^① 平台经济的崛起，已经改变了传统的商品流通方式，使得产销者和消费者通过网络平台实现交易，然后通过现代物流和仓储系统实现精准配送，形成了新的商业生态体系。平台经济极大地缩短了资本流通时间，有利于价值的实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流通产业的双重功能包括延续生产的价值生成过程和媒介交换的价值实现过程。^② 一方面，流通过程中的生产性劳动创造了新价值，使得专业化和分工效应进一步发挥，有利于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领域的转型升级，有利于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数字流通力助力媒介交换体系的转型，由传统的相对静态体系转化为跨越时空的相对动态体系，由一元简单交换体系转型为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的多元复杂交换体系，衍生出了更多的新行业和新部门，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马克思讲过：“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③ 数字流通力改变了流通体系，促进了资本周转和价值实现。在流通领域，“生产性劳动”可以创造新价值，但是“非生产性劳动”并不能创造新价值。新价值的创造必须依赖于获得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在数字经济时代，强大流通能力的形成离不开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撑，以及具有数字化技能的劳动者的支持。所以，要更好发挥数字流通力的积极作用，必须充分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劳动者的教育培训问题。

（三）数字分配力的普惠效应可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数字经济时代的分配关系正在发生改变，数字分配力已成为影响收入分配方式和结构的重要变量。数字分配力是基于数字技术、数字要素和数字生产过程形成的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参与能力和实现能力。正如马克思所言：“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地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而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④ 随着数字化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由此导致的生产关系的局部变化，收入分配关系也发生了局部调整。这种调整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客观和主观生产条件的数字化趋势，二是收入分配的普惠性可以有条件地实现。

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涉及两个层次，即生产资料或生产条件的分配，以及收入分配。^⑤ 关于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中需要的生产条件的分配涉及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是物的生产资料，客观的生产条件，另一方面是活动着的劳动能力，有目的地表现出来的劳动力，主观的生产条件”。^⑥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尤其是数据，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资料或生产条件。谁占有这些数字化生产要素，谁就可以在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目前，数字化生产要素的确权、交易、定价和经济价值实现还处于研究探索阶段，但是数据要素按照贡献参与收入分配已

① 参见谢富胜、吴越、王生升：《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第62～81页。

② 王晓东、谢莉娟：《社会再生产中的流通职能与劳动价值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第72页。

③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

④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99～1000页。

⑤ 参见洪银兴、葛扬主编：《〈资本论〉的现代解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8～459页。

经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中明确了,^① 这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除了客观的生产条件以外,数字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也对主观的生产条件,即劳动者提出了新要求。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必须具备数字知识和技能,尤其是数字经济领域的研发者,必须具备高度的创新思维、完整的数字知识体系、过硬的数字技能操控能力等。所以,在数字经济时代,从主观的生产条件来看,谁最先掌握了数字知识和技能,谁就能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获得超过一般劳动者平均工资的高工资,尤其是数字科学家、数字工程师等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为关键的主观生产条件,他们的平均工资已经成为各行业最高平均工资之一。可见,客观生产条件和主观生产条件的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者改变着收入分配的方式和结构。

数字经济具有收入分配的普惠效应,即通过数字连通、数据共享、产业数字化和收入分配均等化,使得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由全体参与者共享。以数字经济中发展较快的数字金融为例,得益于互联网革命,中国实现了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研究发现中国的数字金融不但在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更快,而且显著提升了家庭收入,尤其是对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② 在数字经济中,要发挥其收入分配的普惠效应,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质量和均等化的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截止到2020年3月,中国已经拥有超过9亿网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64.5%,形成了较好的互联互通的数字基础设施和庞大的数字消费市场。^③ 这就有利于消除不同地区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等创造新财富,实现共享发展。二是顺畅的数字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机制。关于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尤其是数据,如何参与收入分配,必须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机制,重点是要完善数据要素的确权、定价、交易和收入分配等相关制度。三是收入分配中的机会均等和过程公平问题。数字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要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让不同的要素所有者拥有均等的机会参与财富创造过程,公平地享受收入分配的结果。

(四) 数字消费力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和进一步扩大内需

根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消费力就是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一般由个人消费力和社会消费力两部分构成。^④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消费力是基于数字技术、数字产品和服务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消费能力,同样包括个人的数字消费力和社会的数字消费力两个部分。马克思认为:“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⑤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生产力创造了越来越丰富的数字消费资料和数字生产资料,为数字消费提供了坚实的财富基础。同时,数字消费中的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引领消费新方向,形成新消费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个人消费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新变化。消费的内涵由传统的物质主导型消费转向精神享受型消费。消费的内容更加多元化,不仅包括衣食住行等生存型消费资料,还包括教育、医疗、养老、文化、娱乐、新闻、资讯等发展型和精神享受型生活资料。其中,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发展,以及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品的出现,很多消费内容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② 参见张勋等:《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经济研究》2019年第8期,第71页。

③ 参见《CNNIC发布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cn/gwym/xwzx/rdxw/20172017_7057/202004/t20200427_70973.htm,2020年12月5日。

④ 参见洪银兴:《马克思的消费力理论与扩大消费需求》,《经济动态》2010年第3期,第1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页。

逐渐实现了网络化、数字化和虚拟化。基于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新消费成为一种趋势，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消费观点和消费方式。消费的外延不再局限于物理场所，而是通过现代化的数字基础设施、仓储物流系统和平台经济等实现了线上线下消费的互动、国内国际消费的结合。由于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全球性普及，消费正在突破传统地域界限的限制，一国消费者可以通过谷歌等国际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浏览其他国家的新闻资讯，通过亚马逊和淘宝等跨国电子商务平台购买他国生产的各类商品，通过微信和推特等在线交流平台与其他人建立联系并产生互动，通过去哪儿和爱彼迎等商旅服务平台订购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酒店服务等。

在数字经济时代，社会消费的内涵和方式也在发生新变化。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社会消费也被称为公共消费，主要用于一国的国防安全、政府运转、科学研究、文化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城乡公共设施和服务等方面。随着数字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消费领域的数字化倾向日益明显。例如，国防建设的信息化数字化要求采购信息化数字化新装备，社会治理数字化要求政府在信息技术使用和大数据管理等方面发挥示范作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文化服务的数字化也要求全社会必须加大投资力度支持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信息化和数字化是新技术变革推动的结果，也是社会需求转型的需要。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①当前，必须通过大力发展数字生产力和加大政府投资力度等培育社会消费力，通过高质量的数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更好服务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消费成为扩大内需的关键途径。当前，为了应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②统筹发展和安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③扩大内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扩大内需的重点是充分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好投资和消费的作用。其中，消费是扩大内需的关键。2019年，最终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但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有20%左右的提升空间，^④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红利有待进一步释放。数字消费赋予了消费新内涵，创造了消费新模式，正在成为扩大内需的关键。因此，必须通过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消费环境和完善收入分配改革等，进一步形成数字消费力，充分发挥数字消费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另外，也要不断扩大公共领域的数字消费，重点加大国防安全、政府运转、科学研究、文化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城乡公共设施和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建设力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障。

二、生产关系的局部变革与培育数字经济竞争力

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角度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是人类社会发

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

②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77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

④ 参见《美国消费对GDP贡献接近83%，印度约为76%，那中国消费表现如何？》，<https://xw.qq.com/amhtml/20201118A07TLV00>，2020年12月5日。

展的基本规律。在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的内涵发生了改变,生产了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同时,生产关系的局部变革也将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的局部变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时,需要采取更多的有力措施培育数字经济竞争力,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 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关系的局部变革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数字经济是由数字技术驱动社会生产方式变革产生的一种新经济系统,是以现代通信和数字技术为基础,由数据采集、数据驱动、平台支持、专业分工、网络协同的经济活动单元所构成的新组织或新交换系统,链接了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多个环节,形成了新经济关系。马克思非常重视总体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影响,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①作为新经济关系,数字经济中孕育的数字生产力正在重塑生产资料与劳动结合的方式,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生产与流通、交换、消费的有效对接,缩短了流通时间;有效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经济社会逐渐向数字化和智能化等高质量发展阶段演进。数字生产方式正在带来生产关系的局部变革,使得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数字化和集中化趋势在交换关系、劳资关系、组织关系、资本积累过程等方面都发生了新变化。^②生产关系的变化,又会影响数字生产力的发展。能够适应数字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变革,将会进一步释放数字生产力发展的新动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数字经济时代,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四个环节已经实现了数字化变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予了新动能和新活力。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四个环节的数字化赋能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外,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再生产也可以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可以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和环节,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收入分配形式和劳动关系等提出了新要求。为了适应数字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范畴。^③关于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交易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权能的界定和实现问题,正在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同时,政府正在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大力推进数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断发掘数据的经济价值,努力促进数据的共享和安全保护,着力解决平台经济的垄断问题等。在收入分配方面,数据要素也要同资本、劳动、土地、技术和经营者才能等一样,按照在财富创造中发挥的贡献参与分配。在一些数据要素占据核心地位的企业和行业中,数据要素所有者将会获得更多的收益。在劳动关系方面,平台经济改变了劳资关系和劳动组织形式,^④出现了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等就业新模式。在平台经济中,由于众包、分包和外包就业模式的大量出现,劳动关系正由传统的雇佣关系转变为小生产者与平台的商业合作关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② 参见谢富胜、吴越、王生升:《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第62~81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④ 参见谢富胜、吴越、王生升:《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第73页。

这将深刻改变就业形式和社会保障缴费模式等。数字经济尤其是平台经济的劳动关系的新变化，一方面使得劳动者获得了自由选择就业形式的更多权利，工作方式和工作时间更加灵活，甚至可以作为自我雇佣者参与就业和获得收入；另一方面，在众包、分包和外包就业模式下，劳动者面临着更多的就业市场不确定性以及社会保障“缺失”困境等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需要坚持共享发展理念，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来保障新型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权益，进一步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

总的来讲，为了适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通过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双重作用，将数据纳入新生产要素，让数据参与收入分配和保护新就业模式下劳动者的权益等方式，调节了社会生产关系的部分内容，进一步促进了数字生产力的大发展，助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培育数字经济竞争力，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世界范围内，数字经济已经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经济形态。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体，可以在反垄断、“四化”建设和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有益探索，进一步培育数字经济竞争力。

1. 强化反垄断，保持数字经济活力

当前，平台经济的规模效应、交叉网络效应以及利用算法和算力导致的“监管脱敏”，使得平台经济领域出现了垄断问题。^①其中，封杀竞争对手产品、虚假评论、对竞争者恶意差评、平台要求商家“二选一”、大数据“杀熟”、捆绑销售、利用混合经营模式规避监管等，是平台经济中不正当竞争和垄断比较常见的形式。

202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为2021年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②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已经成为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保持市场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措施。2020年12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涉嫌垄断的京东、天猫、唯品会等进行了反垄断调查和处罚，^③并派调查组进驻阿里巴巴集团提取相关证据资料。^④随着平台经济不断做大做强，监管部门对数字经济领域的垄断问题由过去以发展为目的的“放任与宽容”态度，转向了现在以公平发展和共享发展为目的的“严格监管”新态度。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跨国数字巨头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数字经济中的反垄断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例如，美国司法部对谷歌等公司进行反垄断调查、^⑤欧盟对谷歌等公司的垄断行为开出巨额罚款等。^⑥同时，在国际社会中，主要国家已经就数字经济领域的垄断问题和数字税等问题展开国际协调和谈判。中国对平台经济等的反垄断，是基于顺应世界范围内的反垄断趋势、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释放市场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的战略格局而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数字经济中的垄断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抑制了其他市场主体的创新，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权

① 参见熊鸿儒：《我国数字经济中的平台垄断及其治理策略》，《改革》2019年第7期，第52~61页；杨东：《论反垄断法的重构：应对数字经济的挑战》，《中国法学》2020年第3期，第206~222页。

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9日。

③ 参见《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京东、天猫、唯品会三家平台不正当价格行为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http://www.samr.gov.cn/xw/zj/202012/t20201230_324826.html，2020年12月30日。

④ 参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调查组进驻阿里巴巴，提取相关证据资料》，https://www.sohu.com/a/440816998_120209831，2020年12月27日。

⑤ 参见《美司法部正式出手 谷歌会成下一个微软吗》，<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1182151503037828&wfr=spider&for=pc>，2020年12月5日。

⑥ 参见《欧盟为何对谷歌开出巨额罚款？》，https://www.sohu.com/a/242484087_117965，2020年12月5日。

利和利益。因此,加强反垄断势在必行。具体而言,需要根据数字经济,尤其是平台经济的特点重新界定“相关市场范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达成垄断协议”的内涵。相关市场界定是反垄断的首要条件,不同的界定标准会导致相关市场的范围大小不一致。对于平台经济,必须考虑到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的规模效应,明确界定其市场范围。在平台经济的竞争中,借助于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以及嵌套型的市场结构,大型平台企业容易形成市场支配地位。判断大型平台企业是否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需要针对平台经济技术和组织特点重新考虑其表现。平台经济的竞争也容易形成大平台的垄断竞争格局和跨界混业经营格局。在跨界混业经营中界定是否存在“经营者集中”,需要考虑平台组织的核心业务多元化问题。借助于发达的算力和算法,平台经济可以形成隐形的垄断协议,这就需要提升反垄断监管中的技术识别能力,建立适应平台经济组织特点和大数据技术特点的新监管模式。当前,强化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最终目的就是要保持数字经济活力,维持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红利。

2. 通过“四化”建设,培育数字经济竞争力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各国激发经济增长动力的新经济形态。为了在数字经济领域创造更多的财富,形成国际竞争力,各国都加快了数字技术研发、数字组织创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市场培育和数字技术人才培养的战略布局,尤其是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制定了战略性的数字经济发展远景规划。印度、马来西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试图通过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支持来形成数字经济竞争力。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体,具有数字经济发展的规模优势和一定的竞争优势。但是,中国的数字平台公司主要凭借中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成长为巨型公司,其国际化水平和营收规模与美国公司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国际竞争力有待提高。根据《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态势暨景气指数报告(2019)》,就市值而言,亚马逊的市值为7344.16亿美元,谷歌C类股的市值为7234.65亿美元,而排名第三的中国公司腾讯控股的市值仅为3816.43亿美元。^①谷歌、脸谱等美国公司通过国际化成为跨国数字公司,其营业收入和利润大部分来源于美国以外,而中国数字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主要来源于国内。因此,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中国的数字公司需要加快实现区域化和国际化,需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通过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治理数字化和数据价值化这“四化”大力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在数字经济的“四化”发展过程中,有一定的优势,也存在一定的短板。因此,必须“扬长补短”,不断提高数字经济发展的竞争力。产业数字化是将第一、二、三产业与数字技术进行有机融合,提升产业发展的质量,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目前,我国的第三产业,尤其是商业、仓储、物流、娱乐、咨询等服务行业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较好,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出现。但是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制造业和建筑业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同美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融合度低、创造的数字经济价值相对较低等问题。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安全性,应该重点提升第一、二产业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度,加快发展数字农业、实现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等。数字产业化主要涉及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的发展问题。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

^① 《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态势暨景气指数报告(2019)》,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1907/t20190711_202914.htm, 2020年12月5日。

数字产业化发展具有一定的规模优势，但是在发展质量上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芯片等核心技术和前沿产业还存在“卡脖子”等问题。这就需要通过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和科学布局前沿产业等方式来弥补短板。治理数字化是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运用，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环节。经过改革和发展，中国的数字化治理水平已经处于较高水平，但是仍然存在着治理短板。这些短板既表现在微观组织中的治理碎片化等问题，也表现在宏观层面数字化治理中多元主体的冲突和标准不统一以及大数据安全等问题。数据价值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方向，主要是基于经济社会运行中产生的海量大数据，经过大数据挖掘等实现大数据的经济价值。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资源，必须高度重视其经济价值的实现和分配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已经将数据列为新要素，要与劳动、土地、资本等其他要素一起参与收入分配。^①但是，在经济社会现实中，对于数据产权的界定、定价、交易及其经济价值的实现和分配等问题，仍然需要进行深入探索。

3. 形成“四位一体”的科技创新体系，提高数字经济创新力

当前，大国之间的竞争是以经济、政治、科技、国防和文化影响力为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在数字经济时代，科技创新的作用愈加重要。大国之间关于数字技术的竞争日趋激烈，美国等霸权国家为了保持自身的科技竞争优势，动用国家力量打击华为、中芯国际、TikTok 等中国数字技术公司。中国的数字技术正在快速发展，在应用技术层面实现了较大突破，并借助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相对宽松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形成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数字技术公司。但是，在数字技术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领域，中国与先进国家还有一定差距，尤其是在支持数字技术的核心产品领域，如芯片等领域还存在“卡脖子”问题。

在数字经济时代，科技创新是战略支点，业态创新是活力来源，模式创新是盈利增长点。中国要进一步形成数字经济竞争优势，关键是要构建企业—市场—国家—国际“四位一体”的科技创新体系。企业是市场经济中从事科技创新的主体。从中国数字技术发展的情况来看，中国数字企业抓住了全球数字技术创新的发展机遇期，利用中国的人才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数字技术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市场应用研究方面形成了发展优势。但是，与美国等国家的数字企业相比，中国的数字企业在支持数字技术发展的核心物理技术和操作系统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研发补贴、转移支付等方式激励企业加大数字技术研发力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市场力量，将核心要素配置到价值最大的地方，通过专利市场、科技成果转化市场的构建，形成支持科技创新的市场体制机制。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领域，中国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国家战略科技中心布局，解决芯片等“卡脖子”的技术问题，强化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高科技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安全和可控。在全球化时代，科技要素逐渐实现了全球化配置，科技发展中的国际交流和合作的作用日益加强。为了更好地发展数字科技和数字产业，我国必须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以及两种科技资源和智力资源，更好地形成数字科技创新体系，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三、结论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在科技创新、组织变革和管理创新中实现了蓬勃发展。从世界范围来看,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在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不断提升。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体,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也已经超过了1/3。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在数字经济时代,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正在实现数字化变革:数字生产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数字流通力提升了资本周转与价值实现的效率,数字分配力的普惠效应可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数字消费力将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和进一步扩大内需。为了进一步培育中国的数字经济竞争力并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重点强化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加快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字治理化和数据价值化这“四化”的建设力度,构建企业—市场—国家—国际“四位一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强自主创新,重点突破“卡脖子”的技术问题,打造完整的数字经济供应链和产业链体系,保障产业链自主、安全和可控。

(责任编辑:任朝旺)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Digital Economy Enabl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an Wenlong

Abstract: Digital economy is a new economic form to create social wealth.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digital economy is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production, circ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are undergoing digital reform. In detail, digital productivity provides new momentum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digital flow capacity increases the efficiency of capital turnover and value realization, the universal benefit of digital distribution capacity can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igital spending power will boost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further expand domestic demand. In order to foster the competitiveness of digital economy, China, as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needs to maintain the vitality of digital economy by strengthening antitrust, boost, optimize and expand digital economy through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digit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digitalization and by turning data into value, and raise the innovativeness of digital economy by building the four-pillar technical innovation system.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ocial reproduction